

由學生主辦的哲學家訪談刊物

中大 哲學評論

The CUHK Review of Philosophy

第一期

哲學界的女性

葉茹教授訪談

中文版

出版資料

創刊編輯

祝大為、李國舜、李柏怡

設計及排版

祝大為

指導老師

孟繁麟教授、李詩穎教授

鳴謝

本刊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慷慨支持。
我們衷心感謝凌沛怡女士及曾思琪女士的行政協助，讓創刊號得以面世。

編者的話

親愛的讀者：

論文與正式紀錄保存了學術上的重要成果，卻往往只讓我們看到問題的答案。它們很少記下問題如何被發現、那些沒有結果的多年閱讀、曾經嘗試而後擱置的方法，或某位老師改變研究方向的一句話。

我們創辦《中大哲學評論》，正是為了記錄做哲學的真實過程。我們希望保存哲學系共同的思想歷史，讓讀者看見學術成果背後完整的人。透過記錄同行之間如何影響彼此的思考，以及學者如何面對個人生活與制度環境，我們希望未來師生承接的，不只是已完成的論證，而是有生命力、能為他們引路的學術社群。

創刊號以「哲學界的女性」為主題。中大哲學系曾長期沒有女性教授；後來改變這個局面的學者，以及在那些年間於本系求學的女性，亦甚少有機會詳細談論自己的經歷。為了展開這場對話，我們訪問了葉茹教授。她談到如何選擇研究問題、從高階證據的研究中學到了甚麼、作為形式知識論領域少數女性之一的實際經驗，以及她想對初入哲學界的人說的話。

本計劃得以實現，有賴於願意支持學生塑造自身學術文化的環境。我們感謝中大哲學系的信任，讓我們有空間發展這個計劃。這次對話，是我們所期盼的一項長久、由學生主導的傳統的起點。我們把《中大哲學評論》建構為持續更新的檔案，以書面章程及議定的交接安排為基礎，讓未來的同學能夠延續並發展它。

我們邀請你閱讀、思考，並加入這場對話。如果你覺得這些篇章遺漏了某些聲音或議題，歡迎來信告訴我們。

祝大為、李國舜、李柏怡

創刊編輯·沙田，2026年10月

訪談 · 第一期

與葉茹教授對話

訪問編輯：祝大為、李國舜、李柏怡

葉茹教授畢業於武漢大學，曾到霍普學院（Hope College）交流一年，並於康奈爾大學（Cornell University）取得博士學位。她目前主要研究高階證據（higher-order evidence）、認知容許主義（epistemic permissivism）及形式知識論（formal epistemology）。本次訪談以普通話進行，由編輯譯成英文。本中文版依修訂後的英文定稿編譯，並參照普通話訪談謄本整理措辭。

本刊：你在武漢大學的本科畢業論文，研究的是普蘭丁格（Plantinga）的保證（warrant）理論。之後，你先到霍普學院，再到康奈爾攻讀博士，經歷了三種很不一樣的學術文化。是甚麼促成這一連串轉變？你又是在甚麼時候確定，自己會以哲學為事業？

葉茹：我決定得很晚。高中時，我對人生的意義這類問題很困惑。我是學理科的，但一直對文學感興趣。有位老師告訴我，如果想解答這類人生問題，就應該去哲學系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可是，在武漢大學的頭兩年，我一直很迷茫。讀康德、胡塞爾、海德格爾，幾乎都讀不懂。

本刊：他們有解答你對人生意義的疑問嗎？

葉茹：沒有。

本刊：後來是甚麼改變了你的方向？

葉茹：大三時，一位做邏輯學的老師開了一門「西方哲學問題導論」。他一直強調推理，強調要清楚明白地表述我們的想法，也一直告訴我們，要研究問題，而不是研究人。他的課我每堂都聽得懂，而且覺得自己似乎還有點擅長。他會讓我們分組討論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很喜歡。

本刊：那又是怎樣讓你走到康奈爾讀博士的？

葉茹：大三時，我還申請了一個美國基金會舉辦的交流計劃，每年選幾名中國學生到美國的學院交流。我被分到霍普學院，那是一所非常小的博雅學院，哲學系只有四五位老師。我在那裏只修過一門哲學課，就是「知識論導論」（Introduction to Epistemology）。那位老師其實不做知識論研究；他做的是語言哲學方面的工作，但因為人太少，甚麼課都要教。他的上課方式跟我那位邏輯學老師一樣。他告訴我，在北美，研究基本上都是這樣做的。於是我決定申請研究生，申請了很多學校，而康奈爾給我的條件最好。

本刊：不過，你也曾差點完全離開哲學。

葉茹：我糾結了好幾年。讀研究生的競爭很大，有時學着學着，就覺得哲學沒甚麼意思，好像也沒甚麼用。四年級時，我的導師到新加坡長期訪問，直到我快要答辯才回來，所以有三年我基本上是自己摸索的。我有很多自由時間，也就用來考慮轉行。我到數學系旁聽統計，也到計算機系聽編程，一部分是為了就業。但過了一陣，我發現自己喜歡的，還是那些更基礎的問題。到第六年快結束時，我接受了一件很明顯的事：我適合做學術，而在各個學科之中，我最喜歡的還是哲學。所以就留下來了。

本刊：我們常聽說，分析哲學的博士課程競爭很激烈。康奈爾的環境是怎樣的？

葉茹：比較放鬆，也比較友善。有人說 MIT、普林斯頓、紐約大學或 Rutgers 的競爭大得多，但這些我只是道聽途說。沒有人要求我們五六年就畢業；系裏有些人讀了七八年。也沒有老師逼我們去開會、發表論文。我的論文委員會裏，甚至有位老師叫我不要急着發表，先專注寫好博士論文。我讀書的時候，幾乎沒有人會在畢業前發表。所以，我的糾結不是環境造成的，而是同學都很優秀，我懷疑自己沒有那麼有能力。哲學本身似乎也失去了一些當初吸引我的東西，我不知道為甚麼。不過，探索了其他領域之後，我還是覺得哲學最有意思。

本刊：你曾在一次系內聚會中說到，求學時，你刻意不再把精力放在成績上。你意識到，成績與其說取決於自己，不如說取決於同屆的同學，而你無法選擇他們；把精力都投放在成績上，就是試圖控制不能控制的事。這種哲學分析，今天仍然能幫到你嗎？

葉茹：現在有一個行業叫哲學諮詢（philosophical consulting）。我剛聽說時很困惑：哲學家也能做心理諮詢嗎？它的基本想法是，很多精神上的困擾，是因為你沒有把問題想清楚。你沒有分析這種感受從哪裏來，也沒有想過這種壓力是不是理性的。一旦透過哲學分析，認識到這種壓力不是理性的，你就可以這樣告訴自己，壓力也會慢慢降低。我覺得這是哲學真正有用的地方之一，對我自己也是這樣。當我分析自己的壓力，發現它不是理性的，就會漸漸放鬆下來。

本刊：你現在同時承擔研究、教學和行政工作。這個方法也能幫你應對職業上的壓力嗎？

葉茹：一般的忙碌，不是換個角度、換種思維方式就能解決的。它需要更合理地規劃時間、更有效率地工作，以及更強的執行力。我覺得這一類比較好解決。不好解決的，是那些真正需要轉變心態的壓力。這時候，哲學分析對我就很有幫助。

一旦透過哲學分析，認識到這種壓力不是理性的，
你就可以這樣告訴自己，壓力也會慢慢降低。

—— 葉茹

本刊：在康奈爾，Nicholas Silins 是你的博士論文導師，Maria Lasonen-Aarnio 則擔任校外指導老師。他們如何影響你那段時期的思考？博士論文中，有沒有某個具體想法，是你今天仍在研究的？

葉茹：Silins 研究注意、覺察、意識和知覺，我對這些題目一直沒有太大興趣。但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，學到的並不是某些具體知識。我是那種很容易鑽進細節的人，會在一個很小的地方反覆琢磨。這是好處，但有時也會鑽得太深。我從他身上學到，要重視整體圖景。他上課不會把一個論證講得很細，而是會講一個理論怎樣產生、如何發展，某個論證為甚麼重要，以及我們為甚麼應該關心它。在跟他見面的過程中，我也逐漸意識到，形式化工具真的能幫助哲學。Maria 是我的校外指導老師。我的書前兩章是文獻綜述，當中談到她的工作。在為校準論（calibrationism）辯護時，我必須回應她的層級分離觀點（level-splitting view），而我提出的問題是認知意志薄弱（epistemic akrasia）。在一階層次，你相信 Jack 是兇手；在高階層次，你卻認為這個信念是否理性，仍是一個未決問題。你既不肯定，也不否定，而是懸置判斷。這就像你一方面覺得自己不應該再打遊戲，應該開始寫論文，另一方面卻還在打遊戲。這就是知識論中的意志薄弱。這也不是我原創的觀點，很多人都提出過。

本刊：你在 2023 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，發展了你對高階證據及校準論的看法；你也有一篇即將在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發表的論文，討論證據在決策中的價值。可否用一個實際情境，說明這些抽象想法如何具體影響一個人應該怎樣推理？

葉茹：想像一名偵探相信 Jack 是兇手。現場的痕跡強烈支持這個信念，這就是他的一階證據（first-order evidence）。但他已經很久沒有睡覺，也知道自己在這種狀態下判斷不可靠，這就是高階證據。標準校準論認為，如果高階證據顯示，他在缺乏睡眠時的可靠程度只有百分之三十，那麼他對「Jack 是兇手」的信念程度（credence），就應該降到百分之三十。在我的觀點中，高階證據的作用早了一步。它不是直接決定你的信念程度，而是降低你依賴原有證據的程度。至於信念程度最後應該是多少，還取決於其他資訊，所以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答案。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反應：當你知道自己累了，就不要那麼相信自己疲倦時的判斷。這也能避免一些人指出的、標準觀點所面對的衝突。相反，一個堅持原有信念的人，會讓信念程度完全維持不變。同樣的關注也貫穿了我那篇即將發表的論文：為甚麼我們總想得到更多證據？我們的直覺是，更多證據有助於求真，也有助於作出好的決策。I. J. Good 曾對這個直覺給出一個形式化證明。後來，有人指出他的證明依賴一些假設，並提出反例，認為即使完全理性的人，也應該拒絕某些沒有成本的證據。我的論文就是要回應他們：那些論證不成立；只要沒有成本，原來的直覺仍然成立。能得到的證據，就都去取得。

本刊：你也有一系列關於認知容許主義的論文，探討在同樣的證據下，兩個人是否能理性地得出不同結論。你目前的立場是甚麼？你面對過最有力的反駁又是甚麼？

葉茹：我現在仍然相信容許主義。一個理由來自科學哲學：甚麼信念是理性的，不完全由證據決定；認知目標，以及如何權衡理論美德（theoretical virtues），也會影響它。兩位科學家可能對同一個假說掌握同樣的證據，但一位更重視簡單性，另一位更重視解釋力。他們都可以推理得很好，卻得出不同結論。有些人比較謹慎，即使證據已經差不多足夠，仍會懸置判斷，因為他們覺得形成錯誤信念是最糟糕的結果。另一些人則會在證據大致足夠時形成信念，因為對他們來說，獲得真理比錯誤的風險更重要。我看不出有哪一種權衡方式是唯一理性的；兩種都可以是理性的。最有力的反駁，是 Roger White 在 2005 年提出的。如果對方的信念可以跟我的一樣理性，我憑甚麼堅持自己的選擇？我不能說我的更理性，也不能訴諸擲硬幣，因為那是與真理無關的理由。如果理性容許相反的裁決，陪審員又應該怎樣投票？還有真理問題（truth problem）：White 只是略有提及，Sophie Horowitz 則把它表述得很清楚。如果理性容許對方形成一個錯誤信念，那麼理性對他有甚麼幫助？我在一篇論文中，以收斂理論（convergence theory）回應這個問題。理性所容許的分歧不一定會持續；隨着證據累積，不同立場會逐漸收斂，而它們所收斂到的，就是真理。

本刊：你曾參加東亞及東南亞多個知識論會議，包括 Asian Epistemology Workshop、新加坡國立大學（NUS）的工作坊，以及延世大學的 Frontiers in Epistemology；你也曾在美國、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哲學社群工作。你怎樣看這些地區的知識論發展？當這些社群與英語世界的交流越來越多，會出現甚麼變化？

葉茹：不只是知識論，整個亞洲的分析哲學社群都在壯大，主要是因為越來越多人到這裏工作，包括到西方留學後回來的人，以及從一開始就在那裏受教育的人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變化。以前，我為了參加一個兩天的會議，要飛到美國，全程都在倒時差，後來漸漸不想去了。現在亞洲有很多很好的會議，中國內地也有，所以我盡量參加離家比較近的會議。社群越大，就會吸引更多人的回來，也會進一步壯大。讓我有些在意的是，我們仍在追隨歐美的研究議程。即使在中國開會，討論的也還是歐美學者提出的問題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亞洲學者能提出自己的問題、設定自己的研究方向，也讓歐美學者來討論我們的問題。期刊是其中一個因素，因為發表壓力會把人推向比較容易發表的問題。已經有人在建立我們自己的期刊和網絡，值得我們支持，但這需要很長時間。同時，我們也要把現有的問題研究得足夠好，否則沒有人會來。語言確實是一個障礙。第一步還是要用英文寫作、作出貢獻；也許很多年後，他們也會參與我們本地的討論。至於彼此的關係，我傾向於認為是交流，而不是對抗。現在，我們想融入他們的圈子，而不是劃出自己的地盤。未來也許不再有一個中心，大家都在同一個圈子裏，可以競爭，但不是兩個陣營。

本刊：在形式知識論和貝葉斯知識論（Bayesian epistemology）這些領域，女性仍是少數。你有沒有在某個具體時刻或場合，特別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？這有沒有影響你職業生涯中的某些選擇？

葉茹：開會的時候。一個房間裏有二三十人，可能只有一兩位女性。我讀的論文，也很少是女性作者寫的。不過，這從來沒有影響我的研究。我研究甚麼問題，跟有多少人做這個問題、他們是男性還是女性，完全沒有關係；我純粹根據興趣選擇。它影響我的，是報告之後一起吃飯的時候。報告結束，大家去吃飯，如果桌上其他人都是男性，我往往就不去。報告本身討論的是純學術問題，性別在那時沒有關係。但吃飯時，大家會閒聊；男性有自己的圈子和話題，而我又是個比較內向的人，就怕自己融入不了。這沒有給我造成很大的困擾，但確實有影響，因為很多專業上的人際關係，就是在飯桌上建立的。我的希望其實很簡單：身邊能有一些女性同事，可以一起吃飯、喝咖啡。至於向一個滿是男性教授的房間做報告，對我完全沒有影響。那是純學術的事。

本刊：本系有些女同學曾說，因為哲學系長期沒有女性教授，她們缺少榜樣。你有過這種感覺嗎？

葉茹：從來沒有。我一直覺得自己不需要一個榜樣；我想要甚麼，就自己去追求。每個人都很不一樣。但我能理解，為甚麼榜樣對有些人很重要。如果你不太清楚自己的興趣或能力在哪裏，而身邊有一位女性在做這份工作，並且做得很好，就會讓你知道，這條路是走得通的。至於那種認為女性邏輯能力較弱的老刻板印象，從來沒有老師對我說，女生不能做深奧的理論、邏輯或形式知識論。即使真的有統計數據說，女性的邏輯推理能力平均比較弱，也不能說明我個人的情況。那是一個關於群體的數字。如果某個群體的犯罪率很高，是否便意味着我這個屬於該群體的人，也很可能會犯罪？但如果是你尊重的人說出這種話，確實會造成壓力，也可能讓學生覺得，自己不適合這個領域。所以，老師在這裏有責任。

本刊：如果要給處於這樣環境的同學一句建議，你會說甚麼？

葉茹：不管有沒有這種刻板印象，都不用理會。它沒有科學根據；即使有，也只是關於一個群體的統計，不是關於你個人。按照自己的興趣去做。

做任何選擇，尤其是學術上的選擇時，
不要讓性別成為一個因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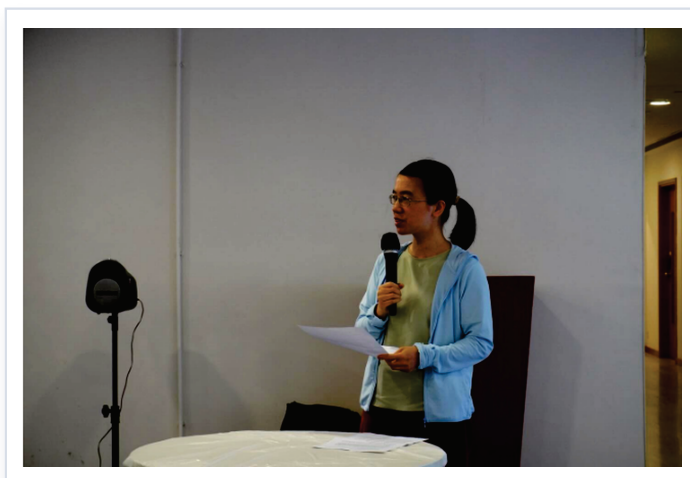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葉茹

本刊：在公平與共融委員會（Committee for Equity and Inclusion）於 2025 年 10 月舉辦的哲學系交流大會（Philosophy Townhall）上，你選擇談到，當你為事業從武漢移居香港時，作為母親所面對的社會期望。這是很多學者都會經歷、卻很少在專業場合談論的事。你覺得為甚麼這麼難談？要怎樣改變，才會讓人更容易開口？

葉茹：最直接的原因，是女性學者太少。而男性似乎也很少願意公開談自己的家庭，可能因為那像是在示弱；當然，這也可能是我自己的刻板印象。說家庭需要你的時間、給你帶來壓力，就可能讓人覺得你不那麼專業。大家會期望，一個認真做學術的人，應該全身心投入學術。我們甚至有一種流行的學者形象：那位午餐只吃一個饅頭、喝一瓶水的北京大學數學家。社會覺得，學者就應該像他那樣，所有時間都用來做學術，個人生活、興趣愛好和家庭都不應花太多時間。我覺得這就是需要改變的。能有幫助的，是更多女性學者，以及大家——包括男性——更願意在日常場合分享學術工作以外的生活。

本刊：展望未來，你希望在哲學系建立些甚麼？

葉茹：我希望把具體的事情做好：好好教課、好好做研究，也承擔自己那份系內服務。如果說有一點小希望，就是在接下來幾年組織一些工作坊和讀書會，讓學生和老師有更多交流。同時，我也希望維護好自己的求知好奇心。我希望研究由自己的好奇心主導，而不是由現實的壓力，或別人對我的期待主導。這樣，我就可以沒有包袱地探索更多以前沒有接觸過的領域。



葉教授在一次系內聚會中發言。

本刊：結束之前，我們想問一個訪綱以外的問題。最近的 AI 模型，在演繹推理上表現驚人；以證明為本的數學，最先感受到了這點。作為形式知識論學者，你認為，如果機器能掌握形式化工具和推理，哲學家還有甚麼工作可做？

葉茹：我從來不覺得，哲學一定需要形式化工具。柏拉圖沒有用這些工具，也能寫得很清楚。今天也有很多學者完全不用形式化工具，仍然能做出很有洞見、很好的哲學。這取決於你研究甚麼問題，也取決於你的表達。有些人能用自然語言把想法說得非常清楚，就沒有必要用工具；工具只是工具而已。的確，哲學跟數學一樣，非常講究推理。即使用自然語言表達，一個好的論證仍然是邏輯推理。但哲學不只是推理，它還需要全新的視角。例如，幾個世紀以來，人們認為自由需要能夠採取另一種行動；後來，法蘭克福（Frankfurt）提出，重要的反而是你的二階欲望（second-order desires）與一階欲望（first-order desires）之間的關係。這是對同一個問題完全不同的理解，不是單靠擅長推理就能得到的。AI 的確已展現出創造力，用人類數學家沒有想過的方法，解決了長久以來的數學難題。但猜想還是人類給的，是我們先覺得那個問題有意思。AI 自己會不會提出有意義的問題，我真的不太清楚。也許有一天會吧。目前它最擅長的還是推理，所以最擔心的是做編程和數學的人。不過，我們哲學家也快了。

本刊：最後，如果有一位剛開始職業生涯的哲學家，有一天讀到這篇訪談，你最想跟對方分享的經驗是甚麼？

葉茹：跟我那時相比，現在年輕學者的壓力大得多。發表論文、找工作、建立人際網絡；很多人跟我說，他們被這些事情壓得喘不過氣。你會感受到這些壓力，但一定要不忘初心，不要忘記自己為甚麼一開始選擇哲學。不要忘記哲學的魅力，也不要失去對它的熱情。你可能會因為壓力而作出妥協，我們都會。但要盡量讓工作由好奇心主導，而不是由好勝心，或外界給你的壓力主導。



左起：李柏怡、李國舜、祝大為與葉教授。

加入對話

《中大哲學評論》是持續更新的檔案，有賴於社群裡每個人的聲音。
如果你想分享觀點，希望我們訪問某位學者，或對創刊號有所感想，
歡迎來信。

閱讀更多

cuhkphilreview.com

致函編輯

editors@cuhkphilreview.com

談學術，談哲學家，
也談我們哲學社群的未來。

對話、記錄、傳承。